

### 让心灵“富裕”起来

继去年“做一个明媚的女子，不倾城，不倾国。以优雅姿态去摸爬滚打；做一个丰盈的男子，不虚化，不浮躁。以先锋之姿去奋斗拼搏”后，浙江大学丹青书院再次惊艳：“我做高富帅，高在学识，富在精神，帅在行动；我做白富美，白在品行，富在内涵，美在心灵。”小小横幅释放出的正能量，令无数网友为之感动。

教育，就该让学子的心灵和精神发展也达到富裕状态，始终以阳光豁达、朝气蓬勃的形象，为社会、他人带来信心和快乐。所以，浙大提出的“白富美”新解，不仅是一种教育创造，更是一种与时俱进的灵魂提升和道德引导。这种指引持续时日，能给师生们带来更多心灵的安静、灵魂的博雅，进而让校园文化充满雅致的精神格调，这才是大学的“大”的意义所在。

“让心灵‘富裕’起来”并不易做到。上学的时候，需要考高分、上重点，走上社会后需要拼命赚钱、买房养家。一些“心灵乞丐”、“心理乞丐”便在重物压、轻心灵的氛围中出现，有的孩子情感冷漠、偏执狭隘，有的因为一点挫折就会产生心理危机。因此，希望家庭和学校教育在给孩子功利要求的同时，也能促动一些“心理调节”，通过必要的课程培训和言传身教，让其懂得“心灵富裕”的重要性。刘克梅

### 排斥外来务工者 缘于自私与冷漠

外来务工者禁止入内，违者罚款二百！位于汉口三金潭小区的一座厕所围墙上，竟然写着这样一段告示语。在厕所旁，有一栋外表光鲜的居民楼。(3月26日《武汉晨报》)

一个人无论是高贵，还是卑微，都会有内急的时候，这也算是人的一件不能免俗之事。看见厕所，却不能进，这让过往此地的外来务工者情何以堪？

修建厕所，为的就是给人方便。厕所修建在人来人往的公共场合，更是为了方便众人。厕所脏了，可以勤打扫。对于不太自觉的人，可以做提醒，譬如，在内部墙上贴上“上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之类的提示语。仅仅是怕弄脏了厕所而拒绝外来务工者入内，显然不妥。

拒绝外来务工者入内，对弱势群体来讲，是一种由某种身份偏见而先入为主的歧视。文明是一种理念，亦是一种生活方式。对持有文明进步理念的其他社会人群来说，也不愿见到此类现象出现。

自私和冷漠是人性幽暗的一部分，对外来务工者偏见与排斥，既是人心不古，又显现这样的人与社会文明之间的距离。看待人的文明，不但要看大事，还要看小事；不但要看整体，更要看细节。

城市接纳外来务工者，只在于他们愿意干那些最苦、最累、最脏的活儿，肯定是有问题的。种种接纳，不应只是出于城市发展的需要，接纳他们，就要创造条件，使得他们融入城市生活，过一种更文明、更有尊严的生活，而不能将他们排除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之外。

在一个文明的体系里，每个人都应得到尊重，每个人都值得被帮助，每个人都该被善意所呵护。这是一种建立在仁爱、宽厚、平等理念基础上的价值观：每个人的幸福是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看一座城市的文明尺度是，这座城市怎么对待弱势群体。对待这些弱势群体的尺度，也是一种理性的尺度、良知的尺度。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得到所需要的理想事物。从社会学的概念上解释，人的社会适应能力是有差异的，外来务工者的活法也是由社会分层方式所决定。

社会其他人群有自己的尊严感，外来务工者亦有他们作为人的尊严。照顾他们的尊严，就是照顾社会的平等价值，就是照顾所有人的尊严。只有当外来务工者都活得有尊严，其尊严都能得到保障的时候，所有的人才可能安心地生活。这样的社会，才称得上是良性的社会、和谐的社会。

今语

### 当官即不许发财

两会闭幕后，李克强总理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对反腐倡廉的表态掷地有声：“为官发财，应当两道。既然担任了公职，为公众服务，就要断掉发财的念想。”区分“两道”，划出了一条红线：想从政，就不能发财；想发财，就别来从政，绝不能脚踏两只船。

俗话说：“无病不怕瘦，当官莫嫌贫。”清廉是中国吏治文化的核心，历来为人所推崇。唐代武则天告诫官员：“清静无为，则天与之；恭廉守节，则地与之。”南宋吕本中在《官箴》中写道：“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古往今来，人们称颂的清官好官，无不重公义轻私利。范仲淹非但不取不义之财，而且把俸禄拿出来创办义学，施惠于民。杨善洲为民辛劳一生，最后还把苦心经营的农场捐出来，造福于民。

每个人都有选择职业的自由，你可以选择从政，也可以选择经商，但不能选择通过从政来发不义之财。然而，总有一些党员干部经不住金钱的诱惑，滑向犯罪的深渊。据今年两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披露的职务犯罪案件数字，算下来，近5年大约平均每两个月查处一名省部级干部，每两天查处一名厅局级干部，每天查处7名县级以上干部。这样的害群之马在广大干部中只是少数，造成的社会影响却极其恶劣。究其根源，很多人是被一个“钱”字晃花了眼，弄昏了头。

“当官即不许发财”，这是当年爱国将领吉鸿昌警示自己和部属的“箴铭”。对今天的党员干部来说，尤其要划清“当官”与“发财”的界限，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而不是“金黄银白，但见了红眼心黑，哪知头上有青天”，整天以聚敛钱财、富家子弟为能事。当官即不许发财，这是党的性质宗旨决定的，也是职业要求所决定的，应当成为干部从政的底线。

应该说，现在干部的工资和福利待

## 政府要习惯过“紧日子”

民生支出不能减，财政增收压力大，这中间的收支矛盾只有通过严控政府性经费支出解决。即使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政府也应该过紧日子，把钱用在刀刃上。

两会期间，财政预算报告再次抢夺公众眼球。2012年，在中央财政收入仅增长9.4%的情况下，支出却增长13.7%，特别是民生领域的各项支出继续保持了高增长的态势，其中住房保障支出增长44.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22%，医疗卫生支出增长17.2%。

今年头两个月，全国财政收入增幅继续回落。在财政收入不宽裕的背景下，如何保障民生领域各项重点支出力度不减？李克强总理给出了答案：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政府就要过紧日子。

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以“营改增”等为主要内容的结构性减税措施还将继续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落后产能淘汰和房地产调控等因素也将持续制约经济增长速度，加上政府机构改革的职能转变带来的非税收入减少，财政收入再出现过去那种高速增长的状态，显然是不现实的。

然而，我国在民生等领域的财政刚性支出仍然十分巨大。环境领域问题频发，最近困扰多地的雾霾天气、地下水污染、土壤重金属污染等事件，都表明生态环境已经到了非治理不可的地步；住房保障任务艰巨，今年要完成城镇保障性住房基本建成470万套、新开工630万套的任务，还需要财政继续加大投入力度；我国刚刚编织起世界上覆盖人口最多的社会保障网，但保障水平仍然较低，需要不断提高城乡居民医疗、养老的保障水平；虽然我国实现了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4%的目标，但农村的义务教育薄弱和城市的上学难、上学贵等问题依然突出……

民生支出不能减，财政增收压力大，这中间的收

支矛盾只有通过严控政府性经费支出解决，即使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政府也应该过紧日子。因为政府自身并不产生收入。政府多用一分钱，百姓和企业就要多交一分税。过紧日子应当成为政府的习惯。

政府过紧日子，首先要在压缩“三公经费”上下功夫。对此，新一届政府已经“约法三章”，“三公经费”只减不增，并且要一级做给一级看。最近一段时间，在中央八项规定的带动下，政府部门的公务接待已经得到了较好的规范与控制，但作为三公经费支出“大头”的公务用车经费支出依然很可观。据统计，全国目前公车费用占到“三公”经费总支出的六成以上，这部分费用得不到有效控制，整个政府性经费支出就很难真正降下来。

事实上，在公务用车方面，除了严格控制超标配车、公车私用等违规腐败现象外，其他可以压缩的空间还有很多。比如，领导外出开会调研时，能否集体乘坐大型车辆，而不是一人一车的车队出行？领导干部上下班，能否不用专车接送，改为自己开私家车或乘坐单位班车？公车外出办事，能否也捎带上几位相同方向或相近地方的人员“拼车”出行？这些费用看似不多，但如果从公车庞大的数量来计算，每年省下来将会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当然，政府部门过紧日子，在“三公经费”只减不增的同时，其他一般性支出也要进行严格控制。比如，加强会议费、差旅费管理，进一步清理规范庆典、研讨会、论坛，严格控制修建楼堂馆所等。这样，才能有效降低政府的行政成本，把钱用在刀刃上，将更多的财政资金集中起来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吴秋余

### 恋爱登记制

草地上亲昵相拥，长凳上卿卿我我，高校情侣早已成为象牙塔里的一道风景。可如果要像一段段恋情登记在案，再配上“爱情顾问”指导学生该如何谈恋爱，如何和平分手，换作你，你愿意吗？

日前，汉口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推行“恋爱登记制”，对该院恋爱的学生进行摸底，并由老师充当恋爱的“爱情保镖”，调解情侣争吵，开导分手恋人，防止失恋者做出极端的举动……恋爱登记制铺开，掌声和非议声纷至沓来：叫好者认为，部分大学生情感把控能力不强，其恋爱态度与对爱情的理解，需要学校加以引导；反对者则质疑，爱情是一种私人行为，登记的做法有侵犯个人隐私之嫌。 焦海洋/图



### 财政“帮穷不帮懒”的三重意味

楼继伟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会上表示，“财政收入不能持续，承诺过多而收入不够，我们会走向‘中等收入陷阱’的不归之路。另外很多民生政策、制度是不完善的，我们应该帮助穷人，而不应该帮助懒人。”(3月25日《经济参考报》)

楼继伟“帮穷人”的财税体制论述，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因为这将会成为楼继伟履新财政部之后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的方向选择。

首先，“帮穷不帮懒”财税体制改革的取向是市场经济。楼继伟在论述包容性增长方面提出三种财政模式：一种是高税收高福利的发展模式，拉美北欧一些国家采取，目前欧洲债务危机说明其模式不可持续；另一种是低税收高福利的发展模式，所走的路径是扩大财政赤字，以通货膨胀来平衡，这种模式也不可取，因为将使穷人更穷，陷入恶性循环；第三种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即财政政策支持发展机会的创造，而不仅仅关注结果。在这种财政政策下，国家适当提取财政收入，实施适当的再分配政策，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争取使每个人都能根据自身的条件获得发展的机会，享受发展的成果。

其次，“帮穷不帮懒”的财税体制改革将走低税负发展之路。这正好吻合群众的期待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因为市场经济的根本目的就是财富蛋糕做大做强。要做大财富蛋糕，必须依靠企业和个人发展积极性，企业和个人通过努力获得财富蛋糕，政府拿的越多，企业和个人就拿的越少，企业和个人创作财富蛋糕的积极性就越差，政府拿的越多，企业和个人拿的越多，企业和个人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就越高，经济社会发展也就越快。“帮穷不帮懒”的激励因素就在这里。

最后，“帮穷不帮懒”的财税体制改革在路径选择方面，笔者认为重点将针对促进产业结构发展的方面的财政政策进行改革和完善。这一路径选择也符合中国实际，因为中国当前针对个人财产方面的信息公开制度不健全，税收征管模式跟不上，贸然推进这方面的改革，会引发社会矛盾，阻碍社会公平，对市场经济发展的稳定环境具有破坏作用；另外，高额的遗产税和个人所得税等则加剧人才和资源的外流，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帮穷不帮懒”的财税体制也是有底线的。笔者认为，这个底线就是让每一个人都有饭吃，适当提取财政收入的用途就是要保住人们的生活底线，不管是穷人还是懒人。李宁

### “人民战争”能止息“PS敲诈”吗？

“PS敲诈”虽技术门槛不高，但也不会人人精通，犯不着“全社会动员起来”，只要司法部门加大查处力度，足以形成威慑。

近日，湖南双峰县出现大量“打击利用PS技术合成淫秽图片敲诈”的标语，引起网友围观。这些标语包括“全社会动员起来，掀起一场打击利用PS技术合成淫秽图片敲诈的‘人民战争’”等。娄底公安局局长尹华凯还称，“依法快捕、快诉、快判，打击此类违法犯罪行为要依法从重从严”。

此前有媒体报道，“合成艳照”诈骗犯罪活动，在双峰已经形成了一个“地下产业链”。2012年以来，双峰县共破获此类案件127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7人。3月15日，双峰警方逮捕了4个团伙的8名犯罪嫌疑人，涉案总金额达4530余万元。

鉴于“合成艳照”已非个案，加强治理确是当地警方的职责所在。但铺天盖地的标语，尤其是“人民战争”、“快捕、快诉、快判”等的说辞，在法治时代却显得有些不伦不类，反而让人怀疑“运动式治理”的有效性。

一个非法活动形成“地下产业链”，绝非一日之功。如果在“PS敲诈”刚露端倪的时候，就依法查处打击，恐怕就不会形成现在这样的声势。而一旦等非法产业成“燎原”之势，打击起来的确很困难。这方面，双峰县其实有前车之鉴。

早在2004年，就有报道援引多地警方的说法，称“湖南双峰是假证之乡”。2009年双峰县长视察时做假证时，还表示要“尽快摘掉‘假证之乡’的帽子”。但在老问题未彻底解决，新问题又爆发，当地应反思其治理之道。

大贴“人民战争”标语的做法，看起来声势浩大，效果未必有多好。“PS技术合成淫秽图片敲诈”，虽然技术门槛不是很高，但也不会人人精通，犯不着“全社会动员起来”，只要相关部门依法加大打击力度，足以形成威慑。 西坡

## 教育不能沾上铜臭

日前，珠海某小学向午休学生按天收取一元“午休费”，引发热议。校方称所收费用是经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政府到风办批准的，并全部上缴财政，学校没有截留。

在教室利用课桌午休是学生的天然权利，校方的解释显然难以服众。毋庸置疑，“午休费”是典型的教育乱收费。而乱收费更可怕，是其披着“合法”外衣，“收费许可证”不仅让人师表的教育工作沾上了铜臭味儿，更是对义务教育的一种玷污。

这些年来，相关部门三令五申遏制乱收费，但远未从根本上杜绝，加重了义务教育阶段家长的负担，更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在信息不对称、地位不平等的前提下，当事学生及家长往往无可奈何，敢怒不敢言。义务教育具有公益性、免费性、普及性等特点，任何收费项目都要经过严格的法律授权和行政审批，否则“再穷也不能穷教育”的共识只能成为一句空话。 陈广江

教育的一种玷污。从历史上看，政府公务员在机构调整中一般是在等待被安排的，鲜有如下岗工人那样自谋出路、二次创业的典型案例。这似乎已成一种传统，甚至是机构改革中公务员享有的一项权利，因为他们曾经“做出牺牲”，现在又“做出牺牲”，所以“有责任”，也有义务把他们安排好”。收费少了，位子没了，头头脑脑却还都在，只好安排一些人去做巡视员、调研员。虽无实职，亦无责任，可慰的是待遇一切照旧。

新一轮机构改革的核心理念是政府转变职能。政府职能发生转变，机构设置自然要作相应调整，附着于机构的人员也就不能随之发生变动，而最难办的就是这“人往哪里去”。

其实，这样的现象平日也很常见，政府机

## 改革要触及“吃财政饭闲人”的饭碗

新华社前天的一篇报道，列举了从前机构改革中的种种怪象，诸如改出一批吃财政饭的闲人(如满天飞的巡视员，不调研的调研员)，少了正式工多了“临时工”，以“改革”之名行“涨价”之实，行政审批明放暗收、小放大收等等。机关里吃闲饭的、长期做“临时工”的，什么时候没有？因此，此类怪象与其说由机构改革直接导致，不如说是当下日常行政的一般状态，但对已经推开的新一轮机构改革也不无警醒作用。

新一轮机构改革的核心理念是政府转变职能。政府职能发生转变，机构设置自然要作相应调整，附着于机构的人员也就不能随之发生变动，而最难办的就是这“人往哪里去”。

从历史上看，政府公务员在机构调整中一般是在等待被安排的，鲜有如下岗工人那样自谋出路、二次创业的典型案例。这似乎已成一种传统，甚至是机构改革中公务员享有的一项权利，因为他们曾经“做出牺牲”，现在又“做出牺牲”，所以“有责任”，也有义务把他们安排好”。收费少了，位子没了，头头脑脑却还都在，只好安排一些人去做巡视员、调研员。虽无实职，亦无责任，可慰的是待遇一切照旧。

其实，这样的现象平日也很常见，政府机

关和事业单位都有，可能只是在机构改革的当口更突出一些罢了。有的领导干部58岁“退居二线”，有的地方则规定50出头就须退出领导岗位，但离真正的退休还有两年或更长，这些人这些年就过着被财政供养且优哉游哉的生活。这无疑意味着财政负担的增加，而在另一方面则是人力资源的浪费，尤其是严重背离权利统一的行政原则。至于没有领导职务的公务员，遭受的心理震荡可能更大些，但同样会被负责任地得到安排，而分流来分流去，总不出政府系统或政府掌控的领域。

基于以上分析，似乎有把握说，在机构改革中政府工作人员的流动重组，很可能只是一种内部循环，并且只会增加政府的运行成本而不是相反。但这不是机构改革的必然命运，而是长期行政惯性的必然结果。

又比如“临时工”现象。政府若有临时性工作，雇用临时工是必要的，但临时工若在一个部门长期存在，则要么是编制定得不合理，要么是机构管理效能低，要么是部门管了一些不该管的事，才显得人手不够。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的到位，仅仅是为行政改革的深化奠定了一个必要的前提。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机构改革搞了很多轮，但看上去人们的“官念”与往昔并无不同，公务员只能进不能出的问题一直未得到根本解决。也就是说，机构改革可能触及一些人的官位，却没有从根本上触及公务员的饭碗。既然饭碗还是铁做的，报考公务员热十几年来未见减退又有什么不能理解呢？但政府变革中的公务员，除了等待被安排，还有什么路可走呢？有人说，“庙”没有了，“和尚”也得改行。问题是，做惯了和尚，念经、撞钟还可以，旁的却不会，或也不屑于干，要改行就难，更何况有些人一旦入得庙来，就笃定生是庙的人、死是庙的鬼？因此，最妥当的出路是再造一个新庙，这样就又有入来给自己烧香磕头了。如果奉行自然淘汰，则既不用触及自己的灵魂，也不会触动别人的利益，但付出的代价是改革的成效打折扣，甚至改革的结果被吞噬。

抱定政府过紧日子、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的决心，就必须大力改革公务员制度，特别是建立健全公务员退出机制。一朝当上公务员，便只能进不能退，只能进不能出，终身不复有生计之忧，此种十分特别的观念与现实，只会拖累包括机构改革在内的行政变革。 滕朝阳